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周 文 李吉良

【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大国竞争格局，是针对当前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紧迫性提出的时代命题。新质生产力在驱动能力、支撑载体、发展方式、生产力要素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其形成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30）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吉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4）02-0114-1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凸显出当代社会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生产力发展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随后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与培育大国竞争优势的必然举措。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传统生产力增长路径与粗放式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的引入明晰了以科技创新释放新动能的生产力跃迁路径与全方位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这不仅凸显了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一致性。既有研究中大部分文献着力阐发新质生产力理论本身,忽视了从学理层面把握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关联。因此,与既往研究不同,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和二者耦合关系出发,深入剖析和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及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探索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顾名思义,是显著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属于经济范畴,要厘清其相对于传统生产力具有何种独特性,从学理层面必须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因此,对“新质生产力”的考察首先要回到“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

生产力发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范畴,从历史渊源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配第、斯密、萨伊、李嘉图、李斯特等人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所影响。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从生产要素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的内涵。进入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从分工的角度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同时,还提到土地是具有生产力的物质,引入了“自然生产力”概念。^[5]之后,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格外关注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将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视作“强大的生产力”,并指出这三种生产力间的关系,“自然是人的伙计,是人的工具。人越能不用自己和资本的力并把越大的部分的生产工作交给自然,自然便越有益于人”^[6]。同样,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也肯定了土壤、水等自然要素具有生产力。^[7]并且,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李嘉

图指出通过机器的发明、技术的改进等方式改善生产便利条件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也增加了未来生产的能力。^[8]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强调国家整体生产力和工业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个人生产力与国家生产力的差异、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差异,指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9]。

不同于生产力本身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本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揭示了生产力的本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被普遍视作“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10]。概括地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1],因此,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的能力^[12],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13]。总而言之,我们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演变的考察发现,生产力的概念存在包括自然生产力(以土地、水为代表)、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等不同内涵和质态的理解与阐释。马克思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14]因而,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历史阶段与条件的演变中不断深化的。

由此,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范畴,包含着新的丰富的内涵和特征。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之在内涵和特征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科技创新,核心在于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15],目标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新在驱动能力上,新质生产力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新技术为主要动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锚定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



着力实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态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二是新在支撑载体上,新质生产力是以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支撑载体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载体创新上锚定同前瞻性科学技术创新有高度契合性、低消耗、潜力大等特点的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以及海洋装备等;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新潮流、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的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以克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

三是新在发展方式上,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粗放式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速度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既要体现经济增量的提升,也要讲究质量的提高。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新质生产力服务于新经济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从要素驱动、低效率、高污染、粗放式的传统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高效率、可持续、集约式的新型增长方式转变。

四是新在生产力要素上,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升级及拓展的生产力。在劳动者方面,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者主要是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以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智力工人为主。在劳动资料方面,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资料主要为传统机械仪器设备,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升级为具有高端、精密、智能等特点的仪器设备。在劳动对象方面,传统生产力主要以自然物与粗加工材料的物质形态物质为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新材料与新能源,还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数据、算力等新质态劳动对象。

概括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质”上的不同,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质量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从中国独特国情来看,我国生产力发展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规律,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应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一)理论逻辑:生产力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6]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从量到质的跃迁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理论上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代化的普遍过程就是实现生产力从量到质的变化。现代化过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是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过程。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来看,现代化的动力源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带来生产关系调整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可见,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与关键要素。生产力是质与量有机统一的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也正是生产力发生量变与质变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17]

生产力的量变主要体现在一定生产力要素条件下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度量上主要表现为劳动要素投入量和劳动产品产出量的增加。生产力



同样遵循着量变与质变的发展规律,“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8]。当生产力量变到一定阶段,现有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难以解决现阶段生产中的问题与挑战,必须依靠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质变包括多个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生产力质态与生产力变革的作用范围及其影响的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生产力质变既要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要满足特定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全球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机遇,根本目的是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生产力的质变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改变,更应是精神生产力的提升与绿色生产力的创造,将物质生产回归到人的现代化本质上,以新质态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变革与人的发展、加速现代化的实现。

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受到多种要素影响,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9]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提升的作用,科学技术是影响生产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因素。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0]，“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21]。其二,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在开启现代文明的同时进而引发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变革。恩格斯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22]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如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23]

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阴暗面”,只

有将科学技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真正推进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24]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化普遍要求科学技术的创新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理论逻辑上揭示了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作为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路径,以生产力的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累物质基础的契机。

(二) 历史逻辑: 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探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都要“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25],以历史和逻辑的分析方法进行阐释。从各国现代化的普遍历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6]决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总体而言,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现为自然生产力。在自然原始社会,即人类社会的初期,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然,“最早被利用的是动物的自然力”^[27],其中,劳动力自然地形成生产力;“最晚的是机械的自然力”^[28],其中主要包括火、水、风等,所以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同时,由于在这一阶段人类尚处于蒙昧与野蛮时代,这一阶段尚未出现现代机械,原始社会协作分工程度低,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

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劳动具有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重要作用,其中有用的具体劳



动是财富形成的关键。进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出现了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为标志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9]分工的出现扩大了产品交换的范围,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作用越发明显,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自然转变为劳动。同时,生产关系也随之调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在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奴隶制度取代原始社会公有制,推动了人类向现代文明迈进。

第三阶段表现为科技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30]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端,西方国家正式迈向现代化进程,而科学技术所催生的生产力变革则成为引领现代化浪潮的根本推动力。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以蒸汽机、发电机、计算机的发明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直接改善了生产工具,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效率,以全新动力推动了产业的彻底革新和转型,在颠覆人类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新形态。可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迭代速度更快、影响作用更深,科技创新业已取代劳动要素成为影响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第四阶段表现为新质生产力。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总量和技术成果的爆炸式增长推动着数据、知识、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力的结合与发展,催生出更能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阶段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是整个生产力历史进程中的最高阶段。作为科技生产力进一步跨越式颠覆式发展的结果,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更加讲求高质量发展,更加适应现代化发展。

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性颠覆性变革来源于技术变革。“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31]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世界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新时代下必须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历史逻辑,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三) 实践逻辑: 生产力跃迁是现代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32]推动生产力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赢得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也是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冲击的必要举措。随着传统外延式发展动能逐渐不足,中国式现代化势必要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内生型国家竞争优势,从实践逻辑来看,必须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新质生产力是培育大国竞争优势、赢得现代大国竞争的制胜关键,同时,也是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应对之举。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竞争是通过国际贸易与产业分工来体现的,“所谓经济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扩张,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的能力”^[3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以科技创新助推生产力跃迁是大国竞争的角力点。从全球趋势来看,一方面,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潮流,依靠过去传统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外延型增长路径动能不足;另一方面,先发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对后发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等难题,进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等发展困境中。因此,国家生产力的跃迁是当前世界格局下的重要发展突破口,以创新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是“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塑造国家竞争优势、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路径。

随着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掌握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大国更容易实现国家生产力的跃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更是赢得了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与发展先机。当前,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具有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等良好基础,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能更好地发挥既有优势,并在新产业、新赛道、新领域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大国竞争中处于主



动与优势地位。

同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宏观来看,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也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的供需结构失衡、工业化速度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与挑战。问题破解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驱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又能加快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存在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二者在多个方面高度耦合,相辅相成。全面审视二者关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指引,二者具有共同的关键任务、共同的价值遵循、共同的发展要求与共同的实践原则。

(一) 共同的关键任务:加快科技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是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的关键任务在于加快科技创新。

首先,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总体效率上,科技创新是实现“时空压缩”与“并联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串联式”的渐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的跨越式发展过程。在追赶型、非均衡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下,中国式现代化要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西方数百年所完成的现代化阶段,“时空压缩”的关键就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靠科技创新催发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以创新性巨变与传导性巨变纾解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叠加性、艰巨性与紧迫性。

其次,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重要难点上,科技创新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中的关键突破口。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孕育发展新时期,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势必要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其中,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数字革命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性、颠覆性技术进行革命性突破是关键,重要突破口就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就在于科技创新。因此,科技创新作为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是涌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重要引擎,是化解二者目标难点的制胜法宝。

第三,体现在二者目标实现的努力方向上,科技创新是加快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都是以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方向,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是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二者的实现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重要引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与新经济,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转型,进而迈向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消耗低和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 共同的价值遵循:人本发展逻辑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产力创新。在价值遵循上,二者以人作为共同价值追求与依靠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服务于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受“资本逻辑”主导,长期以资本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以攫取剩余价值作为价值追求、以实现资本家为代表的少部分人的富裕为目标,是人的片面的、单向度的现代化。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本逻辑”,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动力与价值追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现代化。人的现代



化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与创新在于切实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提升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劳动者的知识储备、文化素质、劳动技能随着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普及而进一步提高，形成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劳动力是新技术与新理念的源泉与动力。从宏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具有形成强劲人力资本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是实现创新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不竭源泉。从微观来看，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升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使之适应新质生产力低投入、高产出的效率要求。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社会氛围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现代化或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革，其核心在于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广泛地激发人的创造性，这不仅需要劳动者个体的创造，更需要全社会激发人民群众对创造社会生产力与美好生活的热情，形成万众创新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三）共同的发展要求：实现绿色发展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共同的发展要求体现在实现绿色发展上，在实现理念上都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实现路径上均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彰显了二者对绿色发展的共同追求。

从生产方式变革上看，二者都要求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动能变革上，我国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转型期，过去依靠要素投入的生产

方式带来了高能耗与高破坏的资源环境危机，必须以新动能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在质量和效率变革上，过去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自然承载力，生态的生产力作用被忽视，必须以新理念推动生产方式的可持续与效率提升。因此，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创新赋能绿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与现代化指引前进方向。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强调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不仅能引发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并且依靠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高精尖”设备等生产资料，更有利于实现生产方式的环境友好与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质”的变化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特征，引入新质生产力更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确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加快经济体系的绿色转型，进而超越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控制自然、掠夺自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二者发展方向在于引领全产业链实现绿色升级。在新征程上，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我国绿色发展的新材料、新技术整体处于跟跑阶段，新技术与生态环境领域融合不足，急需加快推动绿色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升级。同时，构建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支撑。具体来看，其一，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有赖于以绿色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可持续性强、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等突出特点，加快新能源技术、绿色材料等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其二，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要求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传统产业生产的全链条、全领域和全过程，通过技术升级、降低能耗、采用清洁能源等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才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生态友好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

（四）共同的实践原则：践行自主发展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坚持独立自主与创新发展是践行自主发



展的核心要义，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正是基于我国独特国情的自主创新的道路，是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自主性内源式现代化道路。

一是保持独立自主是二者实践的重要前提。“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34] 不同于西方依靠殖民掠夺实现自身现代化发展，也不同于部分后发国家的“依附现代化”“模仿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自身独立、坚持自主发展。独立是道路探索的前提条件，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决才能跳出西方现代化先在模式的限制，才能掌握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自主是道路探索的发展创新，自主探索才能立足于自身国情，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更是践行自主发展的重要体现。关键核心技术内含较强的技术颠覆性，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适应我国发展的切实需要，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自主选择。反观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对美国的“依附现代化”，一旦两国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触及或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就会立即遭到美国严厉的制裁打击。^[35] 世界历史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无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二是坚持自主创新是二者实践的根本路径。“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36] 科技自主创新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是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根本举措。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部分后发国家依靠比较优势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的外源式现代化道路，可能会面临先发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的技术壁垒，进而陷入“后发优势陷阱”。“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37] 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可控与新质生产力的接续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同时，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也应兼具

国际视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关键领域抢夺制高点、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也要通过合作共享科技成果，共同面对世界性难题。

四、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引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时期，我国仍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创新产业基础薄弱、创新氛围不强等问题，从而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因此，必须从宏观治理、内在动力、支撑载体与持续保障四方面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一）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跃迁离不开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渲染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创新发展与生产力的提升仅仅来自市场的作用，政府被视作无益于创新，甚至被认为是创新的阻碍。按此说法，“野蛮国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38]。事实却并非如此，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有赖于国家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如美国的大项目引领模式、日本的政企联合模式等科技创新模式，国家和政府无不在创新资源配置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9] 国富国穷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40]，因此，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以完善宏观治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实现创新发展与生产力跃迁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以宏观治理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应当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推动党、政府和市场三者有机结合、协同发力。第一，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效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引领作用，明确国家的创新发展方向，协调各类创新主体与资源，更好地应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要践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成果服务于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财富的增加；要发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面对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攻关难题，保持坚韧不拔与迎难而上的革命意志。第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现重大技术攻关。政府在耗时长、成本高、风险高的重大技术攻关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因此，要明确政府和创新中的地位，避免政府“越位”和“缺位”，提升配置效率与治理效能；要加大政府在基础创新中的投入与保障，推动基础研究、人才创新等基础型工作的持续推进，为生产力的质变积累量变基础；要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整体统筹、政策引导、财政支持，鼓励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第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升创新效率。市场是创新的动力源与风向标，有效市场是突破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此，要完善市场基础制度，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与自主创新；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加强区域创新合作与联动，形成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示范作用，鼓励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新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加快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

（二）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走自主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1]其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内生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研发经费、研发强度上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显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仍面临基础研究薄弱的挑战。此外，当前世界经济波动巨大，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受限加大了我国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仅仅依靠模仿学习科技创新实现的“非对称赶超”难以为继，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克服“卡脖子”难题，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化迈进，进而满足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动力要求，才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发展。

第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高效决策、统一指挥，从而形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合力；要发挥公有制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作用，依靠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优势，最大程度地提升举国体制效率；要建构整合式创新范式，针对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痛点与堵点，整合创新主体和资源，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第二，完善创新体制，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面向国家发展需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共同推动生产力跃迁；要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加大基础研究经费等创新投入力度，加快协同创新基础平台等创新平台建设，推进国内基础研究团队建设，培育世界级基础研究类人才；要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支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相关重点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发展，鼓励学科交叉融合，以跨学科视野加快生成突破性成果；要培育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才，同时，要加强应用研究类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要广泛开展创新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秉持开放合作和互利互惠理念，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三，支撑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生产力转化。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发挥产学研协同作用，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形成产业化合力；要加强企业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赋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要完善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在数字经济时代，尤其要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以提升技术体系相关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活力。

（三）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实体经济具有生产性功能，是生产力的载体，



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支撑载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表明，没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经济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后期将金融资本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在高科技的加持下导致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严重失衡，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将更多的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积聚，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实体经济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也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加大社会财富创造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催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面对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促进物联网、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42]要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深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

第二，发挥金融资本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金融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工具，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快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破除科技与金融部门间、产业间的制度壁垒。在资金投入上，既要发挥政府作用，利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国家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拓宽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提升融资可得性。在风险管理上，既要发挥保险和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作用，降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风险，也要发挥国家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指导作用，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的力度并防范金融风险。

（四）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基石。同样，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以科技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产业分工新赛道、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体量庞大但高精尖产业不足、门类齐全但产业链纵深不够、绿色发展增速但结构性转型受限等诸多困难与挑战。^[43]因此，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进一步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推动产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产业体系高端化离不开产业技术智能化，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将持续提升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因此，要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利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搭建智能化数据平台、自动化设备、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产与资源管理智能化，实现产业链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聚焦集成电路、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数字产业集群，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二是践行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绿色可持续产业体系的形成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因此，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应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加快实现绿色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与融合应用，革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工艺与基础设备，践行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要求；要加快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产业长期能效的改进，满足产业绿色化的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要求；要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优化绿色供应链的相关标准要求；要发展好循环经济等绿色新经济模式，以绿色生产力助推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

三是加强产业融合化，促进产业体系多维度



协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提升产业间的配套协作能力,产生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持续保障。要实现新产业与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协同,利用西部大开发、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的人才、资金等支持,在服务和支撑战略的同时,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快更好发展;要强化不同产业间跨界创新、自主创新,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发挥平台企业作用,融通不同行业的产业创新壁垒,加速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发展,政府要加强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等不同类型产业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发挥区域内龙头企业的作用,带动引领区域内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提升产业链水平。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 〔2〕《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第1版。
- 〔3〕〔英〕威廉·配第:《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货币 略论》,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1页。
- 〔4〕〔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260页。
- 〔6〕〔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74页。
- 〔7〕〔8〕〔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7、237页。
- 〔9〕〔38〕〔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6-47、150页。
- 〔10〕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58页。
- 〔11〕〔17〕〔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0、53页。
- 〔12〕卫兴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与争鸣评析》,《经济纵横》2010年第1期。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5页。
- 〔14〕〔26〕〔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160、352页。
- 〔15〕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 〔16〕《马列著作选读 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6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4页。
-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页。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页。
- 〔2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603页。
- 〔27〕〔28〕〔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7页。
-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178页。
- 〔31〕《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7页。
- 〔32〕〔37〕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3、271页。
- 〔33〕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 〔3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97页。
- 〔35〕骆郁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创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 〔36〕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 〔39〕周文、李吉良:《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问题探索》2023年第6期。
- 〔40〕周文、刘少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5期。
-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8页。
- 〔42〕周文、韩文龙:《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 〔43〕徐建伟、韩晓、赵阳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现实基础与策略选择》,《改革》202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田 华〕